

广西学生军：战火中的青春之歌

本报记者刘伟、向志强、陈一帆、雷嘉兴

“我们是广西青年学生军，我们是铁打的一群，在伟大的时代里担负起伟大的使命……”

这首慷慨激昂的歌曲诞生于1937年，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辞别亲人，高唱着这首歌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战场。

80多年过去，如今仍健在的广西学生军战士已经不多。90多岁的甘丽坤患有严重的老年疾病，连亲人都不太记得，但只要唱起这首军歌，她神情动容、情绪激动，还能准确哼出歌曲的旋律。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20世纪30年代，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大批军民投入抗日战场。

在广西的抗日队伍中，有一支队伍较为特殊——他们有的是在校大中学生，有的是失业失学的社会青年，有的是辞掉工作的教师和机关职员，有的是千里迢迢回国的华侨……纵使他们的来历背景各不相同，但都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广西学生军。

1936年至1941年间，广西曾先后3次组织过学生军。1936年6月，广西成立第一届学生军，从事抗日救国宣传。

1937年10月，全国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广西出兵抗日前线，第二次组织学生军，随军做宣传动员群众的工作。这一届学生军转战于鄂、豫、皖前线，后来不少人加入了共产党组织和新四军。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战火逼近广西。广西组建第三届学生军，人数达4000多名，开赴桂东南和桂南各县，宣传组织群众，配合部队作战。这是人数最多、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届学生军。

97岁的甘宗容，当年参加的就是第三届广西学生军。俊俏的面容上带着腼腆的微笑，一双大眼睛十分明亮——甘宗容至今珍藏着当年参加学生军时的照片。那时，她仅有13岁，“大眼睛”是学生军里的哥哥姐姐和教官们对她的昵称。

1938年的秋天，日本侵略者对甘宗容的家乡广西龙州县实施轰炸，一颗炸弹炸毁了她的家。“我已守寡的母亲，带着我怀了孕的姐姐和我，对着断壁残垣，无处安身。”甘宗容回忆，天天躲日寇飞机，根本没办法读书。

不久，报纸上刊登广西学生军招收兵员的通告，工作任务包括唱歌、演戏以及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等。甘宗容所在的龙州中学鼓励学生参军，当时有80多个学生踊跃报名。

广西学生军招收的是16岁至24岁的知识分子，甘宗容年龄达不到，但像她这样能歌善舞的小姑娘正是做宣传工作的好苗子，于是她



广西学生军漫画组成员与他们的宣传画(资料图片)。受访者供图

被破格录取，成为当时学生军里年纪最小的战士之一。

国难当头，像甘宗容这样踊跃报名的不在少数。广西学生军之中，有全家兄弟姐妹一起报名的，有新婚伉俪双双报考的，也有瞒着父母偷偷参军的，潘古就是其中一位。

出生于1925年的潘古，已于2012年逝世。他在一份手记中这样写道：“当我登上满载学生军的木船离开家乡码头时，忽然听到码头上喊我的声音，我回头一看，是父亲，我是瞒着家人报名的。他从近百里以外的边境山村赶来，手上拿着一个包包，举着手喊着我的小名……”

潘古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到了学生军就“有了4000个姐姐和哥哥，没有孤独，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他深情写道：“是祖国的情爱把我们拥抱在一起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把我们连在一起的，爱家人、爱家乡发展成了爱集体、爱战友。”

铁打的一群，经受了战火洗礼的一群

广西学生军承担的任务主要概括为三个字：“叫”（宣传），“裹”（组织），“打”（作战）。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着一枚别具一格的学生军徽章，硕大紧握的拳头里有笔有枪，正好体现了广西学生军同时兼有政治和军事双重任务的特殊性质。

在潘古的手记中，他写道：“苦和累是家常便饭，边走路边睡觉是特殊的享受，星星是我们的向导，月亮是天然的舞台灯光，门板稻草是高级的卧具，小溪池塘是冲掉疲劳的澡堂……这是爱国战士的乐观主义。”

在群众接受抗战教育且愿意接近广西学生军的基础上，他们组织群众成立歌咏队，歌唱抗战歌曲，开设群众俱乐部、救亡室，还举办扫盲识字班、读书会等，在学习中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

中共南宁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刘家幸说，广西学生军还在各地组织抗日游击队、锄奸队，训练群众军事技能，以及教授坚壁清野、侦察敌情、破坏交通等方面知识。

在潘古的手记中，他写道：“苦和累是家常便饭，边走路边睡觉是特殊的享受，星星是我们的向导，月亮是天然的舞台灯光，门板稻草是高级的卧具，小溪池塘是冲掉疲劳的澡堂……这是爱国战士的乐观主义。”

1939年冬，日本侵略军向桂南发动进攻，桂南会战爆发。广西学生军的工作任务从

宣传发动群众转为支前、参战和开展敌后工作。他们日夜奔忙在前线和乡村之间，帮助转移老弱病残，动员群众埋藏粮食、运送伤员。晚上要值班放哨，发现情况立即叫醒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甘宗容清晰地记得，1939年12月30日，她接到任务，突击学唱日本歌和对日军士兵劝降歌。临到上前线时，队长拿来两个手榴弹挂在甘宗容的腰上，一再叮嘱她说：“路上千万要小心，万一遭遇日本鬼子，第一个手榴弹你扔给他们，如果鬼子要抓住你了，第二个手榴弹你就给自己。”

阵地对面是黑沉沉的山峰，日军的炮火不断射来。面对枪林弹雨，甘宗容出奇地镇定下来，她和战友们对着喇叭唱起反战歌。突然间，日军的枪炮声由密而稀，继而停止了一段时间射击，甘宗容和战友们十分兴奋。

军民同仇敌忾，一举肃清昆仑关的全部残敌。不幸的是，有12名广西学生军战士牺牲在抗日前线。

“人们说学生军能文能武、多才多艺。我们则自称为铁打的一群，是经受了战火洗礼的一群。”潘古在手记中这样总结。

他们从未被遗忘

1940年5月14日的《大公报》发表了《桂南会战的学生军》一文，文中写道：“广西学生军是广西战场上最重要的一员，不论在前线，不论在后方，敌占区的两侧，游击区的四方，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被称为“兵王”，“运用他们的智慧，灌输士兵以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

刘家幸说，广西学生军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对抗日战争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广西革命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广西青年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少广西学生军中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后来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军事人才，其中包括中国侨联原主席庄炎林、广西壮族自治区原主席韦纯束等。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西团校原副校长龙润忠等专家介绍，在第三届广西学生军中，共产党员共有100多人，其中很多人都担任基层指战员，在宣传抗日主张、动员组织群众和壮大党的力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西学生军的历史从未被遗忘。龙润忠介绍，20世纪80年代，广西团校成立青年运动史研究室，研究广西学生军历史是课题之一。“我本人和相关工作人员通过采访广西学生军战士及其后代等方式，收集照片、回忆录、徽章、领章等资料，并出版一系列刊物，让更多人知晓抗日战火中广西学生军的故事，让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弘扬下去。”

广西团校原青年运动史研究室主任肖艳霞研究广西学生军历史已有13年。在对广西学生军历史的一步步了解中，学生军战士及其后代对她而言已不仅仅是采访对象，还是家人、朋友。

“几乎每一位采访过的广西学生军战士都对我说过，参加广西学生军那几年，是他们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肖艳霞说，每次和他们聚会，她都会拍照纪念，“这些年，看着聚在一起的人慢慢变少，我心里很难过。”

但同时，这也激励着肖艳霞将广西学生军的故事继续讲下去。“通过我们的研究成果，让后代记住那段炮火连天、腥风血雨的战斗岁月，记住那些为民族解放事业奋勇杀敌、壮烈捐躯的英烈，这是我们作为研究者最想看到的。”

邕江北岸，青秀山南麓，青松翠柏中，数百级台阶之上，广西学生军抗日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1986年，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广西学生军烈士，南宁市在青秀山重建广西学生军抗日烈士纪念碑。

在纪念碑不远处的风华亭里，12名烈士的名字镌刻在一块石碑上，12棵象征着他们的常青树苍翠挺拔、枝叶繁茂。旁边的“广西学生军抗日史料陈列室”内，大量图文和实物记录着这段历史。目前这里已成为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重要基地。

潘古在世时，女儿潘晓春每年都会跟着父亲来青秀山祭拜，如今父亲不在了，她仍保持着这个习惯。“父亲以前很少提起他参加广西学生军的事。在他逝世后，我才开始接触、了解这段历史，也才懂得学生军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潘晓春说，就是一种家国情怀。国家有难时，无论年纪多大，只要有一分力量，就要去报效祖国。

潘晓春一直铭记着父亲的教导：无论走上什么岗位，只有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才能真正有所作为。“这也是广西学生军给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启示。”潘晓春说。

近些年，退休后的潘晓春四处奔走，联系仍在世的广西学生军战士及其后代，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组织成立广西学生军后代“铁群”艺术团，以文艺演出等方式宣传广西学生军的爱国事迹，每一次穿着学生军的服装站在舞台上，演绎父亲经历的故事，唱着父亲唱过的歌谣，潘晓春总是心潮澎湃。

令潘晓春欣喜的是，广西学生军后代群体渐渐壮大，甚至第三、第四代也加入其中，“我想，他们一定会很欣慰、很自豪。”

在广西团校，“90后”教师蒋晓慧也加入广西学生军历史的研究之中，“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要铭记历史、不忘初心，传承发扬广西学生军的爱国主义精神，承担起我们新时代青年人的使命。”

少年罗瑞卿的“觉醒年代”

本报记者李力可、张海磊

烟波浩渺的嘉陵江缓缓流过川东北绸都南充，城北舞凤乡清泉坝马家坡（今南充市顺庆区）是江边的一片肥沃平坝，1906年5月31日，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罗瑞卿，就出生在这里一处小山坳上的破落地主家庭。

从出生到1926年离开家乡的20年间，罗瑞卿既感受了家庭没落的沉痛和封建思想对自己的束缚，也接受了开明的新式教育，逐渐成长为一名有革命思想的进步青年。

明灯般的“良师”照亮求学路

建于罗瑞卿故居的罗瑞卿纪念馆中，完好地保存着他少年时期曾经用过的一盏油灯，这盏灯陪伴了他的读书时光。而少年罗瑞卿也曾遇到过两位如明灯般的“良师”，让他接触到革命思想，坚定了革命信念，走上革命道路。

一位是曾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张澜；另一位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

1920年，张澜回到老家南充，担任南充县立中学和县立瑞明女子中学的校长。1922年，从大林寺城北小学毕业后的罗瑞卿考入了南充县立中学普通科。

当时，张澜聘请了共产党员张秀熟、李鸣珂等人来校任教，在张澜和老师们的引导下，罗瑞卿每天都到阅览室阅读《新青年》《新蜀报》等进步报刊，也让他结交了任白戈、任伯芳等同样追求进步的同学。《新蜀报》主笔萧楚女的文章说服力极强、充满感情，极大地影响了少年罗瑞卿。”罗瑞卿纪念馆馆长雷军说。

1924年，罗瑞卿又参加了南充反“佃当捐”的斗争。当时，军阀何光烈在南充推行“佃当捐”，收取地主和佃户、当铺老板和当户双方各自出地租和典当钱的十分之一作为捐税，引起南充各界公愤，南充县立中学进步师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佃当捐”斗争，罗瑞卿和两位同学将何光烈的“征收委员”秦同淮痛揍一顿。

听说学生打了“征收委员”，何光烈的官兵砸了南充中学的校牌，并包围了学校，与护校学



这是6月23日在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拍摄的罗瑞卿故居(无人机照片)。本报记者王曦摄

改善了工人的福利。“罗瑞卿等进步青年启发了丝绸工人的思想觉悟，工人们在他离开南充后仍然不断开展工人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六合丝厂还涌现了全国劳动模范等先进个人和集体。”李永春说。

这一斗争轰动了整个南充。之后，其他工厂的工人们也都相继开展反对资本家剥削的斗争，也提出了“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福利”的口号。

但罗瑞卿投身学生运动、声援工人举动，却加深了他与外祖父鲜锦堂之间的矛盾。

违反外祖父“约法三章”

“在罗瑞卿的成长过程中，鲜锦堂扮演了非常复杂的角色，一方面他资助了罗瑞卿的学业，另一方面也是极为顽固的封建家长。”雷军说。

罗瑞卿就读于南充县立中学期间，母亲罗鲜氏病重，父亲罗春庭整天游手好闲，罗家田地已快变卖一空。为了让家中省下一张嘴吃饭，罗春庭将罗瑞卿介绍到一家绸缎铺当学徒，并为他包办婚姻娶一位林姓姑娘为妻，这让罗瑞卿颇为不满。

鲜锦堂得知外孙的遭遇后大为光火，接回了罗瑞卿并将他重新送回南充县立中学。但他也同罗瑞卿“约法三章”：一不准看鼓吹民主思想潮流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异端邪说”；二不准参加任何党派，包括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三是规规矩矩读书。

复学后不久，罗瑞卿便参加了反“佃当捐”斗争，违反了“约法三章”，但作为大户也得到斗争好处的鲜锦堂只是警告了罗瑞卿，让其“下不为例”。

孙中山去世后，酷爱川剧的罗瑞卿又参演了学校组织演出的文明戏《孙中山之死》。得知外孙不好好念书去当“戏子”，鲜锦堂又训斥了罗瑞卿。

南充秘密建立共青团组织后，不愿与外祖父闹翻的罗瑞卿对即将加入共青团的任白戈说：“虽然我和外公有约在先，现在还不能参加共青团，但有什么事大家一起干，我和革

丝厂里的学生教员

创办于1912年的六合丝厂，由张澜和

命生死同心。”此后，罗瑞卿为任白戈打抱不平，并追随共产党员参加了工人运动、担任夜校教员等。“这些举动无疑都加剧了罗瑞卿与外祖父之间的冲突。”雷军说。

1926年，母亲罗鲜氏病逝后，对于家庭再无半点留恋的罗瑞卿决心离家出走。罗瑞卿在自传中写道：“当时，我母亲已死。我对于那个家失去了任何的留恋，加之对于我那个旧式婚姻的不满，因此就想逃离这个家。当时并没有多少革命觉悟，就是闹一点所谓家庭革命，或者叫作赶时髦，当然也幻想学一点本领，能够做一点事业。加之我所钦佩的两个教师李鸣珂、列士训（两人都为共产党员）都是成都高等蚕桑学校毕业的，所以就决心去成都报考这个学校……”

发现罗瑞卿要走，鲜锦堂再次训斥了他，并让小儿子鲜玉府盯梢。鲜玉府在看到罗瑞卿与同学一道走时，想要上前阻拦，被罗瑞卿沉声喝道：“大老表（小舅舅），你不要过来。你过来我就不客气了。”鲜玉府一看自己不是对手便转头回家报信，而罗瑞卿则大步流星赶赴成都。

此后，罗瑞卿由于没有在成都就读的学费，也得不到鲜锦堂的支持，在逗留了两三个月后，罗瑞卿决定投笔从戎，通过同学斡旋得到鲜锦堂汇来一笔路费后，乘船来到重庆，在已先期到达重庆并在共青团省委工作的任白戈介绍下，报考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走上了革命斗争的道路。

如今，六合集团的厂房中，近千名丝绸工人每年能够创造超过3亿元的产值，也有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老厂房，感悟革命年代的斗争精神。在罗瑞卿曾经就读的大林寺城北小学（今大林镇小学），每周的国旗下讲话的主题都是红色故事与红色精神，“这个暑假，我们将把学校打造成学生学习红色文化，感悟红色精神，锻炼红色气质的红色教育基地。”大林镇小学副校长曾煜说。

将帅少年时